

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发展与报刊的勃兴

李灵革

摘要：自1906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学后，浙江的新学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新学造就了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青年学生，他们不仅成为了浙江报刊发展的潜在读者，而且许多人在社会变革中，投入办刊的洪流，直接成为报刊的创办者与编辑者，推动了浙江民间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尽管浙江报刊的勃兴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新学的兴起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使得浙江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新学；学生；报刊；勃兴

作者简介：李灵革，男，副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5-0037-05

浙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最早的几个省市和地区之一，早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美国传教士便在宁波创办了《中外新报》，1898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允许民间办报后，浙江成为全国白话报的中心之一，《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从数量上来看，浙江的民间报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形成一定的规模。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浙江的民间办报迎来了办报的第一次高潮。

考察浙江近现代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勃兴，无疑与清末民初浙江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此起彼伏，浙江无论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中，都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与思想家，如秋瑾、施存统、陈望道、经亨颐等人，他们兴办报刊、宣传革命，推动了报刊的兴起与发展。同时，浙江的经济也是刺激报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鸦片战争之后，浙江便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到民国初年，浙江的民族工业中的棉纺织业、丝绸业等传统行业开始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1915年浙江全省从事针织品制造的厂家大小小有2745家，共有11355名工人，生产衬衫衬裤、手套、袜子、汗衫等，年产值87.49万元，制造的厂家数占全国各省的第四位，工人数占第二位^[1]。1918年左右，浙江兴办了杭州振华布厂等大小近30家棉纺织厂，浙江的纺锤总数居全国第三位^{[2](92)}。除传统轻纺工业外，机械、电力、能源等企业也纷纷创办。1912年长兴煤矿创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建电厂达70余家^{[2](102)}。此外，如碾米、造纸、玻璃、织席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浙江的资本主义商业也出现了勃勃生机，1909年，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杭州城站成了客货的枢纽，随之大批旅馆、饭馆、照相馆在城站相继开设，使城站形成以接待旅客为主的新商业区。辛亥革命后清朝八旗兵在杭州的驻防营地也被改造成以商业和旅游业为主的新市场。加上原有的以经营木材柴炭为主的江干市场，以米行、纸行、箔行和鱼市场为主的拱墅市场，和从鼓楼至官巷口的旧市区一个内外相连的大商业网在杭形成了。繁荣的工业、商业经济，为报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保证了办报资金来源及其广告收入。

除这些因素刺激了浙江的报刊发展之外，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兴起，也是促进浙江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科举的废止与浙江新学的蓬勃发展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并令全国开办新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浙江省由于地处东南沿海,经济殷实、民风尚学,迅速形成兴办新学的第一次高潮。从兴学的地区分布看,浙北的杭嘉湖平原,浙东的宁绍平原以及浙南的温州等地起步较早,所办学堂也多,而浙西、浙南山区和沿海岛屿相对滞后。就办学的情况分析,官办的数量远远不及私人兴办或集资兴办学堂的数量多,这表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士绅、商人,充当兴学的主力军。据《浙江教育官报》资料表明,1907年,浙江省普通学堂、中学小学堂与女学堂蒙养院的数量为1120人,学生数为39285人^[3]。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民国成立后,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以培养共和国国民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民国教育方针和壬子癸丑学制,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过程中跨出了崭新的一步。

民国成立后,教育界要求推行义务教育的呼声愈益强烈,教育部于是确定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遵照政府的决定,浙江省计划到1925年止,每个乡镇普设国民学校1所,并具体核定各县应增的学校数。1912年,浙江省小学数6103所,学生数262295名,由于各方力量的推动,1919年,浙江省小学数为9824所,学生数为419545名。^{[4] (421)}在中等教育方面,自清末兴学以来,中等教育由3种类型的学校组成,即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民国初年,这3类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普通中学在原有11所省立中学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些县立中学和私立中学。在一些条件具备的地方,如永康、诸暨、瑞安、吴兴、东阳、嵊县等地先后建立了县立中学。在杭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等地新办了一些私立中学。其中,由陈训正等人联络士绅开办的宁波效实中学,由于对各科要求较部定中学课程略高,以注重教育质量而闻名,1917年起与上海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订约,凡效实中学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学。1919年,由上虞富商捐资20万在白马湖畔所办的春晖中学,集聚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老师,如朱自清、丰子恺等,又邀请蔡元培、何香凝等人到校讲学,并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诸方面进行改革,一时声誉鹊起,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誉。有资料显示,1912年浙江省小学6103所,小学生人数262295人,至1921年,浙江小学数量达到10688所,在校生达到481603人。^{[5] (203)}另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至1926年,浙江的普通中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学校数为47所,在校生8712人(其中高中生2095人),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已有普通中学,在全国各省中排列居前。^{[5] (275)}

中、高等技术专科和高等院校在这一时期也纷纷成立。1912年8月朱瑞、吕公望发起创办了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同年12月朱瑞还开办了兽医养成所。1913年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改名为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14年之江学堂更名为之江大学;1917年12月,浙江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在严州(今建德)建立;据统计,到1918年,浙江省设立的实业学校共有34所,学生数达2542人。在师范教育方面,到1917年,浙江省共建立了近11所师范学校,还建立了杭州、绍兴、宁波、吴兴、处州等女子师范学校。

二、大众教育的普及直接推动了浙江报业的勃兴

这些新式学校的出现,给这一时期浙江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学生数量和识字人数的增加,为报刊提供了大量的阅读者,间接推动了报业的兴起与发展。

“在早期传播发展中,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的发展之所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得益于许多因素,首先就是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阅读得越多。1870年《教育法》实施后,大众教育迅速普及,也由此带来了阅读的普及,并因此推动了英国出版社、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8]我们可以以此比对浙江报业的发展情况,在1907年,浙江省在校的学生数仅为39285人,但到了1918年至1921年,浙江小学中学在校学生总数达到362439人,10多年间,人数几乎翻了9倍多。在这其中,还不包括清末各

地所办的简易识字学塾，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规定简易识字学塾开设国文、国民道德、算术3门课，并授习字和体操，旨在使民众明人伦道德，掌握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年限为3年以下，1年以上。浙江省根据清政府的旨令，订出指标，大县办10所，中县办8所，小县办6所。根据计划，全省78个厅州县应设立简易识字学塾620所，各地积极性很高，实际设立1057所，入学民众32059人。^[7]这些简易识字也增强了一般民众的基本阅读能力，为报纸提供了许多基础和潜在的读者。1901年，随着《杭州白话报》的创刊，在其后的10年间，伴随着新式教育的起步，浙江省的报纸以白话报为主体，分别在宁波、绍兴、湖州共办起了11份报刊，但总体报纸数量有限。1911年之后，一直到1921年，这10年间，随着报禁的开放，识字人数的增加，新思想的涌进，浙江新闻事业发展迎来了第一次高潮，这段时间浙江共办近百份报纸，发行遍及全省各市县，甚至一些乡镇也办起了报纸，如1912年8月在浙江海门创办的《赤霞报》。

其次，新式教育的改革与提倡“西学”，为近现代浙江报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清末新式教育要求，在中小学设立西学课程，许多学校因此取消了经学，根据时代的精神，设置了大量的西学课程。在浙的中小学普遍开设数学、美术、外语、物理化学（格致）、手工、音乐（唱歌）、体育等。有的中小学甚至在课时安排上，有意加大西学的内容，增加教育行政部门未规定的课程。在大学里，更是广泛开设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现代化的专业课程。西学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创造性，使西学逐渐成为教学领域的主角。这些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的精神以及思想播种在了中小学生的心目之中，不仅使学生更易接受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报刊上有关启蒙与革命的传播，而且成为报刊的编辑者，推动这种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另外，在教学改革上，浙江省的国文教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求是学院的监院劳乃宣大力提倡文字改革，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创设注音字母，这为开通民智、普及文化，推动白话文以及其他报纸的发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浙江，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近现代学生群体，这些学生思想活跃、热情洋溢，对浙江近现代报刊发展甚至政治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大、中学生纷纷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积极办刊，许多教师也参与指导，形成了浙江报刊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从1912年至1926年间，在省城杭州，共创办了各类期刊约60多种，而其中学生刊物就占了24种。这其中，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和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在1919到1922年间办的刊物有13种，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钱江评论》、《浙江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半月刊》。另外，浙江省甲等工业学校，浙江女子师范和杭州法政学校的学生也办了自己的刊物，如《晨钟》。这些刊物，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在宁波，当时共有13所中等学校，在“五四运动”中，四中学生在教师洪樵龄带动下，组织了“殖群社”，由学生张传畴、盛在珪负责。私立效实中学也组成“效实学生自助会”。四中和效实中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建立起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以及《效实学生自助会周刊》，成为学生刊物中的翘楚。

在温州，当时尚无大专院校，只有4所中等学校：浙江省立第十中等学校、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艺文中学（基督教会所办）、瓯海甲种商科职业学校。“五四运动”中，6月4日，4所中学学生联合成立了“东瓯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由第十师范学生陈化熙任会长。学生们也自发创办了《新学报》、《瓯海新潮》、《浙江十中周刊》等刊物。

这一时期的教师，在学生洪流的挟持之下，也积极地参与办刊，或者指导学生办报办刊。由教师创办的刊物有《新我》、《教育运动》、《吴兴女学界》、《教育旬刊》等刊物。另外，学生在办刊中，还经常会得到教师的帮助。比如浙江一师的陈望道，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国内革命风潮的感召，从日本回到杭州，经浙一师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当语文老师，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语文教师一起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在他的指导下，学生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来又改为《浙江新潮》。后来，陈望道还帮助学生创办了《钱江评论》，成为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再比如绍兴旅杭学生会所办的《越声》，得到了教

师朱自清的帮助,创刊之时,朱自清亲自为其写了发刊词。

三、迅猛发展的浙江新学与风格独特的浙江报业

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发展,给浙江报刊的勃兴培养了大批受众和传播者。由于浙江新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有规律,使得浙江报刊的发展,具备了与其他各省报刊发展不同的特点。

首先,浙江新学发展快,覆盖广,受其影响,浙江省办报的地域范围也相当广,各市、县,甚至一些乡镇都办兴起了办刊的热潮。

如前所述,在浙江省政府和民间办学的推动下,浙江虽然人口不多,但新学发展速度惊人,浙江中小学校学生数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五位。在新学创办的第一时期,也就是辛亥革命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堂已大批兴办。根据1907年统计概况来看,兴办学堂最多的是宁波府属的慈溪、奉化,绍兴府所属的山阴县、萧山县、嵊县,台州府所属的黄岩县,温州府的乐清县、平阳县以及海宁州。从民国建立到五四新学的第二时期来看,全省各地中小学数大量增加,如“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遂昌,民国成立前仅有小学19所,1919年增加到74所,有石乡之称的青田县,1913年仅有小学26所,1923年增至105所。^{[4](421)}遍布浙江各地的中小学,为浙江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编辑者与阅读者。从1905年始,浙江许多县都出版报纸,如永嘉的《温州大公报》、《新学报》,诸暨的《诸暨民报》,平湖的《平湖日报》、《平湖新报》,临海的《赤城日报》,海盐的《澈浦报》,桐乡的《新桐乡报》,上虞的《春晖》,新昌的《新工昌》,奉化的《新奉化》等等。在一些发达的乡镇,甚至也有学生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报刊,如由沈雁冰在家乡乌镇创办的《新乡人》等。

其次,浙江新学培养的中小學生数量众多,因此,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中,这些学生迅速走上历史舞台,使得这一时期的浙江报刊数量迅速增大,但办刊时间较短。

青年学生思想活跃、特立独行、激情澎湃,但同时容易冲动,缺乏耐心,经济上没有独立,容易受到挫折打击。前一种特点,使得他们在中国历史剧变,特别是五四运动中,迅速行动起来,创办了大批的进步刊物,后一种特点,也使得许多刊物办刊时间短暂,迅速夭折。

五四时期,由于政府、学校对学生运动持保守态度,学生自发的爱国活动得不到政府与学校的支持,因此,在资金来源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许多学生救国联合会只有通过学生的节俭与其他地方来的捐助举行活动、进行演讲并创办刊物。如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为了支持爱国运动,中西女校全体女学生,均“减去早餐,储资捐助学生联合团体公用,并于每晚开会祈祷,冀获神庥,挽救中国危亡。”^[8]浙江也与天津的情况类似,学生常常节衣缩食,靠其他爱国人士的捐助来创办刊物,进行爱国运动。因此,资金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加上政治上受到官府的打压和限制,因此办刊时期都非常短暂。《警钟报》、《椒江日报》、《金衢严公报》、《衢县商报》、《东浙日报》、《浙江青年团月刊》、《救国旬刊》、《东阳学生联合会会刊》、《新东阳报》、《浙江新潮》、《救国讲演周刊》、《钱江评论》、《民铎日报》、《曲江工潮》、《乍浦评坛报》、《平湖新报》、《绍兴教育界》、《稠州嘉言报》、《瓯报》、《瓯括时报》、《责任》、《义乌新报》,都是只办了几个月便夭折了的。有的甚至在创刊的第二个月便停办了。《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1919年11月创刊,同年12月停办。《钱江评论》,从创刊到停刊也只会从1920年1月至6月办了半年多,共出了13期。其他学生刊物如《浙人》、《新学刊》、《效实学生自助会周刊》、《救国讲演周刊》、《晨钟》、《进修团团刊》、《越声》等办刊时间都未超过一年。

第三、浙江新学的教师中,有大量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这些老师不仅自己办刊,而且影响了大量学生,使得五四时期的报刊政治上狂飙突进,走在全国思想的前沿。

浙江省派遣留学生赴日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居国内领先地位,1897年,清政府派遣的日本留学生中,就有杭州蚕学馆的汪有龄等2人,此后,浙籍留日生不绝于途,据1901年底统计,中国在日留学生269人,内浙江39人,居第三,另女子留学3人,内浙籍2人。另据中国留学生会馆1903年编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中统计,1903年3月至11月间,浙江留日学生有151名,毕业17名。民国初年,浙籍留日学生数仍居高不下,1913年,浙江留日学生官费为160名,1916年11月,在日本的浙籍官费生有124人(全国共1824人),列省际第四位^[9],而1912—1925年间,浙

籍官费留日生共有274名。这只是官费的统计，而实际上，当时赴日留学大多为自费生，如1926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上，有各种人员1038人，只不过由于自费生队伍构成的复杂，在统计上稍显困难罢了。^[10]

这一时期中国的留学生，留欧美的大多学习技术，而留学日本的却是为了变法维新，从政治上改变中国，使其繁荣富强，因此这些人的思想异常活跃，政治热情高昂。例如，曾经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杭州白话报》的陈叔通，曾中过进士，被授为清政府翰林院编修。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政法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906年回国后在杭州参加反清革命组织，五四时期的许多学生、刊物都受到这些留日学生的影响。再比如帮助学生创办《浙江新潮》的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都曾留学日本。而当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也曾留学日本，其所聘的教师李叔同、鲁迅等人都曾留学日本。在这些教师的指导下，浙江创办出在五四时期著名的刊物《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其中，由省立一中和甲种工业学校创办的《双十》杂志，后来改为《浙江新潮》周日刊，在第二期中，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施存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如果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可能反对他。我该怎么办？文章阐明了：要求“父慈则子孝”，不可片面地苛求儿子尽孝这样一种观点。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军阀政府和省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大为震惊，认为这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的邪说。最后，竟下令停刊《浙江新潮》。甚至校长经亨颐也被迫辞职，引发了学生抗议政府的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以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无产阶级报刊和留日教师的影响下，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也影响了部分优秀的学生和一些浙江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所办的刊物里，也开始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在曾经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的帮助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创办的《钱江评论》，发表的文章有《新青年的新建设》、《“社会共产主义”与“人情”》、《中国人与社会革命》等。该刊第九号发表的《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还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对苏俄宣言最早的反应之一。

近代报刊的产生、发展、转型，都与受众、传播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于新式教育的产生，诞生了一大批深受西学影响的中青年学生。这些青年通过参与社会变革、从事教育、参加办报等活动，逐渐完成了从旧式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型。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而通过办报宣传、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推动了浙江报刊发展的新一轮的高潮。

参考文献：

- [1]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96.
- [2]金普森等.浙江通史·民国卷·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3]浙江教育官报[J].1908(5).
- [4]张彬.浙江教育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 [5]浙江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教育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 [6][英]凯文·威廉姆斯.英国大众传播史[M].刘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7]浙江教育官报.1911(64).
- [8]中西女校之热心赞助[N].益世报.1919-05-25.
- [9]教育周报(浙江省教育会主办)[N].1916(第144期).
- [10]李明华.浙江近现代教育体制确立过程中的外来影响[J].浙江学刊,1996(2).